



杜聰明

台灣近代藥理學之父、醫學教育之舵手

吳文星(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撰

壹. 家世與求學



▲ 杜聰明任高雄醫學院院長

圖：杜淑純女士提供

杜聰明，號思牧，1893年8月25日（陰曆7月14日）生於滬尾（今淡水）大屯山麓的北新庄百力夏。父杜日鳳、母陳愛，務農，育有三子，聰明為么子。

長兄生財熟習漢學，日治初年在北新庄車埕店仔口開設書房，教育鄉里子弟，並曾擔任北新庄仔區區長。二兄家齊接受新教育，滬尾（今淡水）國語傳習所畢業

後，考入臺北師範學校，畢業後先後任教於大龍峒、滬尾公學校（今台北市大龍、台北縣淡水國民小學），其後轉入實業界。聰明自9歲起隨開設書房的長兄生財習漢文，漸次啟蒙，並奠定良好的漢學基礎。11歲，入學滬尾公學校，經常名列前茅。1909年3月，以第一名成績畢業，獲台北廳長優等賞。旋以第一名成績考取臺灣總督府醫學校，體格檢查被評定為「丙下」，險遭除名，幸代理校長長野純藏獨排眾議，以身體可以鍛鍊為由，破格錄取。對此一機緣，其後聰明曾賦詩一首感懷，吟道：「考成榜首合先頒，矮小身材難過關；校長若非一言助，無知今日在何山。」

聰明入學後，開始勤練身體，諸如徒手體操、揮棍棒、拉單槓、游泳、洗冷水浴、登山等運動莫不持之以恆，鍛鍊不懈。學業表現則始終極為優秀。1914年4月，遂以第一名成績畢業於醫學校。接著，選擇進入臺灣總督府研究所擔任助手，追隨堀內次雄、小泉舟教授研究細菌學、寄生蟲學等。

由於深感學力不足，1915年春，聰明自費前往日本留學，負笈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先隨賀屋隆吉教授研究內科學，繼而追隨醫學部首席教授、藥物學泰斗森島庫太教授研究藥物學。1922年12月14日，終於以「種種の藥物が



『ヴェラトリン』の筋肉作用に及ぼす影響に就き」之論文，獲得京都帝國大學醫學博士，成為日治時期台灣第一位榮獲博士學位者。一時聰明成為台灣社會的焦點人物，臺灣總督府當局將他當作「殖民地樣板」而大事宣傳；台灣民眾則莫不同感與有榮焉，將他視為是台灣人的英雄和希望。連日本國內的評論者亦對其評價甚高，認為其以30歲之齡獲得博士學位，實係博士人物中少見者，足見其為台灣人之「天才雋秀」；其喜好文學，詩、文俱佳，專門學術研究更是追根究底；而其應對彬彬有禮、恭謙敦厚之紳士態度，當可對現今博士之輕佻浮薄、不修邊幅予以當頭棒喝。由上顯示，聰明不僅認真做學問的態度受到肯定，其待人處事的表現更是備受時人的稱讚。

貳. 獻身醫學研究和教育

聰明自醫學校畢業之初，即放棄進入醫院擔任醫師或自行開業之途，而選擇從事醫學研究工作。首先，在臺灣總督府研究所擔任助手，研究細菌學。接著，前往京都帝國大學深造，研究內科學、藥物學，攻讀博士學位。

1920年10月，當其即將完成博士論文之際，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校長堀內次雄特地延聘聰明為該校講師，並准其以在外研究員名義，留在京都完成論文；同時，奉京都帝大醫學部之派遣，研究藥物學。翌年秋，應聘為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助教授，並兼任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技師，敘高等官七等，主持實驗治療學研究室。1922年春，進而升等為教授，講授藥理學等科目。

1925年12月至1928年4月，聰明奉派以臺灣總督府在外研究員身份，前往美、加、英、德、法、義六國進修，研究藥理學、病理學，並發表研究成果。

聰明擔任醫專教授之初即主持藥理學教室，以極為有限的經費購置圖書儀器，並利用實驗治療研究室的設備和經費相配合，在十分克難的情況下從事研究，尤其著力於鴉片、嗎啡、蛇毒、漢藥等之研究。其於1929年4月，應聘為

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囑託，進行鴉片煙膏及鴉片副產物之性質和反應等之實驗研究；並前往朝鮮、滿洲（中國東北地區）、上海等地調查毒癮除癮問題。8月，向總督府提出「鴉片癮者矯正治療醫院設置建議書」。是年底，進而應聘為臺灣總督府警務局囑託，領導從事鴉片煙癮矯正治療工作。

1929年12月，臺灣總督府發布鴉片新特許政策，引起台灣人有識之士強烈的批判，並向日內瓦國際聯盟總部提出控訴，國際聯盟決定派調查團來台調查。為了因應，總督府旋於1930年1月設立「臺灣總督府臺北更生院」，作為鴉片癮者矯正所，任命聰明為醫局長。聰明以「漸減法」治療矯正吸食鴉片和打嗎啡患者的毒癮，並發明一種微量嗎啡成分定性定量檢查法，從尿液中檢查上癮者有無吸毒之習慣，以決定療程。由於其對鴉片癮者之矯正治療及嗎啡類慢性中毒之實驗研究貢獻卓著，1937年8月，遂榮獲日本學術協會賞；9月，獲日本政府頒授五等瑞寶勳章，可說實至名歸。1945年11月台灣光復之初，更生院改制為臺灣省立戒煙所，聰明繼續被任命為所長。翌（1946）年6月，最後一名女性患者陳桂英完成矯正出院，戒煙所終於完成其歷史任務而宣告關閉。總計17年間共矯正了鴉片煙癮者11,498人，聰明可說是台灣鴉片煙癮治療史上最大的功臣。

聰明突破1930年代之前日人對台灣毒蛇研究侷限於免疫學和血清學研究之窠臼，將研究方向轉為其所專長的毒物學和藥理學研究，以三大重點指導學生從事毒蛇研究，其一為毒蛇的毒物學作用研究，其二為關於被毒蛇咬傷的統計調查，其三為毒蛇的藥理作用與製成「鎮痛劑」的人體實驗。因而培養出李鎮源、楊振忠、彭明聰等蛇毒專家，於戰後轉換研究方向，致力於蛇毒在體內特殊現象的探討及蛇毒成份的分離，進一步將台灣蛇毒研究推向國際舞台。

聰明雖身為西方醫學的研究者，惟對傳統中醫並不排斥，反而致力於中醫藥的科學研究，廣泛蒐集中醫藥書籍，從事漢藥的藥性、藥理研究。1928年，曾撰〈關於漢醫學研究方法之考察〉一文，在《臺灣民報》連載31期，引起廣



大的回響。其後擔任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教授時，曾向學校當局提出設立漢醫學研究機關之建議書，並分別於1937、1942年向總督府當局建議全面調查研究台灣藥用植物，以及儘速對漢醫藥學進行科學的研究。1943年8至11月間，聰明奉總督府之派，前往日本、朝鮮及中國東北、華中、華東、華北等地，考察漢藥市場、蒐集漢藥書籍、調查漢藥產銷狀況，並視察各地的中醫學校及中醫醫院。戰後初年，其擔任臺大醫學院院長時，繼續向當局建議在臺大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增設漢藥治療科，惜亦功敗垂成。顯示其鍥而不捨致力於推動中醫藥科學化。迨至晚年，聰明仍提倡中醫藥科學化、中西醫學一元化不遺餘力。蓋其「深信真理惟有一個而已，中西醫學當然須要一元化之」。

1936年以前，先後有40名醫專畢業生進入藥理學教室跟隨聰明研究，共發表131篇論文，研究成果優異，獲得日本學界普遍的認同和肯定，聰明因此建立其學術地位。1936年，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成立之初，聰明被首任醫學部部長三田定則延聘為教授，列名為當時被稱譽為全日本最優秀的醫學教授陣容的成員之一，擔任藥理學講座，主持醫學部藥理學教室，聰明在該教室落成時提出其理想為培養具備紮實的化學、生理學、病理學基礎，以及能奉行其師高木友枝

「為醫者之前先學為人」格言、智德兼備、智術兼修之藥理學者，並以使該教室成為東亞甚至是世界最優秀的研究室之一。依上述理念，嚴格要求研究生必須於五、六年內發表四至六篇論文，方可提出學位審查之申請，加上該教室空間、經費及設備條件均較過去優越，由是研究業績更加獲得肯定。1939年該教室主辦日本藥理學會第13屆年會，聰明並獲選為該年度會長。至1945年先後有21名醫學部或醫專畢業生進入該教室，該教室先後出版《藥理學教室論文集》



▲ 1937年杜聰明穿著高等官服留影

圖：杜淑純女士提供

19卷，刊載論文397篇。在其熱心指導下，先後造就了40餘位醫學博士。1944年，聰明出版《藥理學概要》一書。

此外，1930年，其糾合施江南、朱江淮、王超英、楊慶豐等留日習醫學、理工出身的台灣人成立「臺灣理工學會」，致力於促進台灣人的科學研究。

要之，身處殖民統治之下，聰明頗能突破種種限制，塑造自己，成為具有特色的醫學研究者和教育者；並以其所學致力於改造台灣社會的工作，因此，其從事蛇毒、鴉片、嗎啡等研究，主持毒癮之矯正治療工作；從事中醫藥研究，推動傳統醫藥科學化工作。其治學嚴謹，研究功力深厚，研究成績斐然，指導後進以嚴格著稱，且均卓然有成，成為推動近代台灣醫學發展的要角。藥理學教室的研究傳統和成果奠定戰後躋身國際舞台堅實的基礎。聰明已對近代台灣醫學界留下不可磨滅的貢獻。

參. 主持臺灣大學醫學院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結束在台灣的殖民統治。聰明被中華民國政府任命為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院及附屬醫院、熱帶醫學研究所、赤十字會醫院的接收負責人。其運用和日本醫界熟悉的關係，順利完成接收的工作，並設法將戰時疏散到桃園大溪的醫學標本、器材、藥物及文獻等完整無損地運回台北，使改制後的臺灣大學醫學院及附屬醫院迅速恢復舊觀，可說為戰後台灣醫學教育的開展奠定良好基礎。由是政府進而任命聰明為首任臺灣大學醫學院院長兼附屬醫院院長，以及熱帶醫學研究所所長。

翌年，聰明先後被推舉為台灣醫學會會長、台灣省科學振興會理事長、台灣醫學會理事長、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等要職，其顯然是當時台灣醫學及科學界的龍頭，同時，也是台灣社會民意的代表，自不待言。

戰後初年，日本人紛紛被遣送回國，臺灣大學醫學院師資一時出現青黃不



接現象，聰明毅然起用一批年輕的醫師擔任教學與研究工作，肩負起醫學院傳道授業的重任，例如彭明聰、李鎮源、葉曙、董大成、徐千田、林天祐等均在其大力提攜下，步入醫學界神聖的殿堂，共同為台灣醫學教育盡力；其後，他們亦均力爭上游，嶄露頭角，成為醫學界名重一方之士。

1947年，爆發「二二八事件」，聰明亦挺身擔任「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兼救護組組長，堅持不讓國軍部隊進駐醫學院基礎學教室，只同意讓其進駐學生宿舍，以免實驗儀器遭到破壞；結果，當中央政府派軍隊大舉鎮壓時，據聞聰明亦被列入「黑名單」，迫使其不得不躲藏避禍，方免於如其他許多台灣人士紳名流一般冤枉地被捕殺。但臺灣大學當局則以其擅離職守為由，將其免職。直至中央政府派白崇禧將軍前來處理善後時，聰明始在歡迎會上向白氏表明其為中國國民黨老黨員，對國家絕無二心，獲得白氏口頭保證其無事。5月，魏道明出任台灣省主席，任命聰明為省政府委員，充分證明二二八事件期間其並無違法之行為，同時，亦解除其心理之不安。翌（1948）年7月，臺灣大學當局再度任命聰明為醫學院院長。

聰明主持臺大醫學院期間，十分堅持「學術獨立」，例如中央政府遷台之初國防醫學院院長林可勝曾向其提議，仿對日抗戰時期大學合辦之方式，將國防醫學院與臺灣大學醫學院合併經營，然而，聰明斷然反對。「合併方案」遂不得進行。而鑑於日治時期台灣沒有齒醫學科和藥學科，在各界的期盼和敦促下，聰明五度向學校及省政府當局提出計劃書，爭取設立牙醫學系和藥學系，惟始終未被接受；直至1952年11月，其再向台灣省政府提案，才獲得支持而編列經費。1953年8月，臺灣大學終於通過設置牙醫學系和藥學系案。該兩系之增設，聰明的積極規畫及爭取實功不可沒。

肆. 創辦高雄醫學院

1953年7月底，聰明辭卸臺灣大學醫學院院長職務。接著，應聘出任「私立臺灣醫藥專科學校創設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本著拓荒精神，在富紳陳啟川捐出土地十一甲作為校地下，翌（1954）年7月，成立私立高雄醫學院，招收醫科新生一班61名。10月，舉行首屆學生的開學典禮。當時，校舍尚未興建，暫時借用愛國國民學校禮堂，隔成三間，一間為教室，另外兩間分別為學生餐廳兼自修室及學生宿舍。該校可說在極其克難的狀況下開辦起來的。

1956年8月，高雄醫學院獲教育部准予立案。聰明一方面慘澹經營，積極致力於「建校」，1955年秋，第一棟校舍竣工；第二、第三棟校舍相繼於1956、1959年竣工；先後成立各種專科教室，並購置新穎的醫學器材。1957年，增設藥學系、牙醫學系各一班，並開辦附設醫院。數年間學校初具規模。

另一方面，聰明秉持「樂學至上，研究第一，嚴格管哩，愛護學生」之治校理念，以辦一所能融貫歐美日精華於一身的大學為目標，因此，其要求學生除了基礎醫學、臨床醫學等專業科目必須精通外，數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一般科目亦不可忽視。尤其重視外國語文的學習，要求學生除了英文之外，於一、二年級須學德文，三、四年級須學法文，同時，必須另學拉丁文、日文，學到使自己能閱讀德、法、拉丁、日文的醫學專門書和文獻為目標。聰明親自領導教學，自任院長兼教授，親自講授「中西醫學史」、「藥理學」、「中西藥學」等課程，出版《中西醫學史略》（1959）、《中醫藥學評論》（1971）二書。此外，開辦之初即採美國的上課五日制度，星期六、日兩天讓學生休息和運動。雖然1963至1966年間，因人事及財政問題而爆發長達三年的「高醫風波」，導致聰明於1966年10月辭職，結束其主持長達12年的校務。惟不可否認的，當時高雄醫學院已是一所頗具規模、成為國內醫學教育重鎮之一的學府。

為獎勵成績優良或獎助家境清寒的學生，1954年11月高雄醫學院即創設「杜聰明博士獎學金基金委員會」，分設助學金及獎學金兩項，前者凡學業及



操行成績乙等以上家境貧寒者每學期均可申請，後者是頒給每學年學業成績前三名者之獎學金。1967年，聰明及其夫人林雙隨共同創立「杜聰明博士獎學金委員會」，定期獎勵藥理學研究、優秀學人及學生，以及獎助醫學文化，顯示其始終對培育醫學人才及促進醫學研究不遺餘力。

另值得一提者，聰明鑑於一般醫科學生畢業後只想在都市開業，不願到鄉村，更不肯前往山地服務，於是於1958、1959年接受台灣省政府之委託，在高雄醫學院特設「山地醫師醫學專修科」，招收山地原住民及離島地區青年，給予公費，施以醫學教育和訓練，畢業後分發到山地鄉衛生所服務，因此，培育了60名山地和離島醫師，解決了山地原住民就醫問題，並提高了偏遠地區醫療水準。

聰明對每屆醫學院新生及畢業生致辭時，經常以其師高木友枝「為醫者之前先學為人」之格言，以及著名的細菌學者巴斯德（Loius Pasteur）不時反躬自省受多少教育、為國家做多少事、為人類貢獻多少等盡其在我的人生觀勉勵學生，顯示其對醫學生期許甚高。



▲ 1951年杜聰明全家福
圖：杜淑純女士提供

1975年10月16日，聰明執教55年，正式自教壇退休，感懷賦詩云：「星霜五五教壇聲，自愧年高學未成；蠟燭將溶薪欲盡，微光願逗學窗明。」由上顯示，其對一生盡心盡力奉獻台灣醫學教育頗有功成身退之氣概。

伍. 家庭與晚年生活

1922年5月，聰明與霧峰名門林仲衡之長女雙隨結為連理，雙隨幼年即隨父前往東京求學，畢業於青山女學院，為日治時期台灣女留學生的先驅之一。婚

後育有4男1女，長女淑純，畢業於臺北帝國大學英文科，中年留學，獲得美國猶他州立大學文學碩士、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圖書館學碩士，在美國擔任圖書館主任、館長，夫婿為民俗學家、前台灣省文獻會主任委員林衡道先生。長子祖智，畢業於臺灣大學醫學系，曾任高雄醫學院教授，後留學美國、加拿大，獲醫學及理學博士，旅居美國。次子祖誠，畢業於臺灣大學法學院，服務於彰化銀行。三子祖健，畢業於臺灣大學理學院，留學美國，獲生化學博士，任教於科羅拉多州立大學。四子祖信，畢業於淡江英語專科學校，曾服務於日本駐華大使館。均卓然各有所成。



▲ 1976年元旦杜聰明與女兒杜淑純合影
圖：杜淑純女士提供

聰明一生頗為注意養生，其對養生的看法較一般人更有其學理上的根據。其認為一個人壽命的長短並非光靠後天如何養生，先天遺傳好不好也是決定壽命長短重要的因素，因此，其對於能夠長壽，深切感念父母的恩情。例如80歲生日時作詩一首，吟道：「今朝八十迎新年，所望壽齡達眼前；長路人生能盡力，感恩父母健身傳。」

要之，「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絲毫損傷」之觀念，根深柢固地存在其心中，正是為其後天的養生之道奠定了良基。

其平常生活頗有規律，有感於其身體瘦小，於是自醫學校時代開始，聰明就持之有恆，勤於鍛鍊身體，數十年如一日。自30歲起，研習書法，每天練習四張，寫80個大字，幾乎寫盡各種名帖拓本，對鐘鼎篆書之鑽研頗具心得，並藉以修心養性，先後出版四本《書道學習錄》，各方索求其墨寶者不少。退休後，其仍以收藏書籍、硯臺為樂，讀書、寫字、吟詩成為其家居生活的「三部曲」。其書房中藏有萬餘冊古今中外的圖書及百餘個年代古老的硯臺。

聰明頗為珍重其文字和言論，晚年陸續加以整理出版為《杜聰明言論集》



一～五集，另有《杜思牧家言》（1973）、《回憶錄》（1973）等之出版。

1986年2月25日，聰明以93歲高齡走完其完美的一生，壽終正寢。

綜觀聰明一生始終是領袖群倫、崢嶸頭角，尤其在醫學研究和醫學教育上其長期扮演龍頭的角色，無怪乎，醫學界尊稱其為「教授中的教授，名醫中的名醫，學者中的學者」。論其成功的條件，能堅守志向、篤實力行是最重要的因素，從其70歲自撰古稀感懷詩中可略窺其梗概：「愛惜光陰不輕秒，一生樂學理求明；雖無多少功存世，老馬長途盡力行。」總之，聰明不僅在鴉片煙毒、蛇毒、藥理學等醫學研究上具開創之功，而且是戰後推動台灣醫學教育的導師和舵手。謂其為近代台灣醫學史上影響最深刻的人物，洵非過言。

參考文獻

李鎮源（1947）編。**杜聰明教授在職二十五週年祝賀紀念集**。台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藥理學研究室內牧樟會。

杜聰明（1955）。**杜聰明言論集**，第一集。台北：杜聰明博士還曆紀念獎學金管理委員會。

杜聰明（1964）。**杜聰明言論集**，第二集。高雄：私立高雄醫學院。

杜聰明（1972）。**杜聰明言論集**，第三集。台北：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管理委員會。

杜聰明（1977）。**杜聰明言論集**，第四集。台北：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管理委員會。

杜聰明（1972）。**杜聰明言論集**，第五集。台北：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會。

杜聰明（1975年10月）。**教學五十五年回顧—杜聰明博士退休演講詞—**，南

杏，第22期，頁39～42。

杜聰明博士九秩華誕慶祝籌備委員會（1983）編。杜聰明博士九秩華誕慶祝紀念錄。台北：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會。

杜聰明（1989）。回憶錄。台北：龍文出版社。

葉炳輝著、許成章（1960）。譯南天的十字星—杜聰明博士傳。高雄：新民書局。

謝獻臣（1974）。高雄醫學院二十年。高雄：私立高雄醫學院。

吳文星（2002）。杜聰明—台灣藥理學之父、醫學教育之舵手，台灣歷史人物與事件。台北：國立空中大學，頁423～432。

劉士永（2002）。杜聰明對台灣藥物戒癮治療的貢獻，20世紀台灣歷史與人物—第六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台北：國史館，頁391～431。

楊玉齡（2002）。一代醫人杜聰明。台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

鄭志敏（2005）。杜聰明與台灣醫療史之研究。台北：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

杜淑純口述、曾秋美、尤美琪（2005年）訪問整理。杜聰明與我—杜淑純女士訪問錄。台北：國史館。